

论京房八宫卦序的五行易学思想

苏永利

京房对易卦的排序被称为八宫卦序。由于六十四卦是由八个经卦两两相叠而成，许多易者都以八纯为标准对易卦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八组排列。学界也常因此将八宫卦序与其他八组卦序归为一类或视其同出一源，实际上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京房通过八宫卦序，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五行解卦的易学体系。

当代学者最常与京氏八宫卦序相提并论的是帛易卦序，并尤以“乾坤生六子”立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一般共性之中，简单地分列“六子”的长幼顺逆，就无法真正认识到不同的卦序在表面的异同背后所深含的完全不同的易学思想本质。

京氏八宫卦序与帛易八组就是在两种绝然不同的易学思想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排序。京氏八宫分组，先后顺序为：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帛易八组虽同以八纯为首，但其顺序却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六子长幼顺逆相异，反映了排序者对易卦不同的认识。

多年以来，人们只知道京氏八宫可用于占筮，但却不知道这种八宫排序正是源于京房的占筮体系。京房占筮，首推纳甲。所谓纳甲，就是将十天干分别配属到八个经卦之中，并按照相应的规则全面套用于六十四卦，以定六神。甲乙配乾坤，丙丁配艮兑，戊己配坎离，庚辛配震巽，壬癸又配乾坤。从十天干的先后顺序看，其中六子是从小到大，似乎与八宫分组的顺序不同。但是，京房对其纳甲顺序的论述却正好相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此处八经，在阴阳两分之后，其顺序正好与八宫一致。

京房八卦纳甲的顺序源于月体运行的八卦之象。月体悬天运行，一月之中，晦朔弦望，可成八卦之象。一月三十日分六节，与东西南北中五方相连，阳息阴退，乾象出甲，坤象灭乙，震象出庚，巽象退辛，坎象流戊，离象就己，艮象消丙，兑象见丁。（参见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月体纳甲》、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易注》）京氏八宫分组所遵循的是月体盈虚的自然规律。

帛易八卦排序的根据是“天地定位”。帛书《易赞》曰：“故易六画而为章也，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八卦相错”。文中“火水相射”疑是“水火相射”的笔误。以八卦之象而论，“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在阴阳两分之后就是帛易八组首纯的“乾艮坎震坤兑离巽”。

京房用八宫排序，其理论基础是五行。也就是说，凡是被列入一宫之内的八重，都具有相同的阴阳五行属性。分宫不同，其重卦的阴阳五行属性就不一样。由此可见，八宫卦序的关键在于每宫首纯的阴阳五行定性和宫内八重按照阴阳五行爻变原则所进行的卦变。至于八宫的先后顺序，无论是从京氏的占筮体系还是从京氏五行解易的思想体系来看，似乎都找不到存在的必然。相反，《元包经》卦序倒可以提供一个或然的例证。

元包卦序每组内八重的卦变都与京氏八宫一样，但是，八组的先后顺序却是坤乾兑艮离坎巽震。京氏八宫与重阴抑阳包含了“首坤”的《归藏》易学旨趣相比，它先父子后母女的排序则是继承了《周易》尚乾的易学取向。

京氏八宫，每宫之内八重的卦变也都不离阴阳五行。每宫八重都是在一个八纯的统摄之下进行爻位的阴阳互变，自下而上，分本宫、五世和二魂。

《京氏易传》下卷曰：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三节，天地若不变易，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易卦六爻之变自内而外。所谓“刚柔相易”、“周流六虚”、“五行迭终”正是推行世魂的变卦法则。至于游归之变，恰恰就在于固守一宫的阴阳五行属性，从而保持八宫卦序阴阳五行整体结构体系的完整。八宫卦变，始于爻变，最终都不破八纯之象。上爻若变，宗庙无存。八纯一破，阴阳五行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改变。正所谓“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

帛易卦序的变卦原则就完全不一样了。帛易八组，每组八重的外卦都是一个相同的三画经卦，内卦则是八个经卦按照《易赞》中“天地定位”的顺序轮流与固定不变的外卦相配。可见，帛易卦变的基础是三画的经卦；帛易卦序所反映的是以象解卦的易学思想。

易卦排序的不同必有其不同的机理。对于不同的卦序之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不宜简单地取舍，否则难免产生毫厘之谬。与帛易卦序一样，邵雍的“伏羲卦序”也是以八个三画经卦为基础而进行分组排序的。每组之中所有的下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经卦，上卦也都是由八经按照一定的顺序与下经相叠而配。但是，这八个上经的先后顺序却与帛易不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伏羲卦序与帛易卦序两种易学思想的差异正是反映在上卦八经排序这一貌似细小的区别之上。

伏羲卦序是宋人图书卦序的典型代表。邵雍以数解易，“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正是伏羲先天之数的一至八的顺序数位。伏羲卦序八组的“首纯”也都不在第一位，而恰恰都分别排在各组之内相应的八重数位之上。由于八卦数位的凸显，伏羲卦序在以象解卦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揭示了易数的变化规律。

不过，易卦的排序可以成万千形态，并不是每种卦序都能给人以易道的启迪。但是，像京氏八宫这样能够深刻地揭示易道本质规律的卦序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排序有的只能算是简单的智力游戏。

在伯阳父那里，阴阳观念也是比较粗浅的。只是后来到了《周易》传文中，阴阳思想才变得相对系统：“一阴一阳之谓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周易》传文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阴阳，《周易》卦序也正是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所作的“非覆即变”的对偶排列。

《洪范》与《国语》、《周易》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论阴阳者不涉及五行，谈五行的没有联系阴阳。由此可见，战国以前，阴阳与五行两种思想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正如梁启超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所言：“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五行，其语甚罕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者从未尝并为一谈。”

最早可见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的是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稷下学派。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两段文字表明，邹子已经将“阴阳”与“五行”合而立论了。在稷下学者集成之作的《管子》中，阴阳与五行的著作就是被大量混编在一起的。如《幼官》篇论五行，《四时》篇谈阴阳，《五行》篇更是两者兼述。

汉初的著作对古史往往推测臆断，时常借所谓古之圣子言己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内容就难脱虚拟之嫌。《史记·历书》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似乎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在一起。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史记》中的这段话，我们也就只能视之为神话虚构了。

先秦中第一部有确切著述年代和作者的著作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在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指导下融自然、社会和人生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是对阴阳五行思想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和发展。在该著中，吕不韦及其门客将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完整地结合起来，全面地解释物候、政令和人事等。作为该书主体结构的十二月令则完全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春之月……德为木”，“其日甲乙……其数八，其味酸……天子居青阳左个……衣青衣……禁止伐木……无置城郭……”。“秋之月……德为金”，“其日庚辛……其数九，其味辛……天子居总章左个……衣白衣……诛暴慢……戮有罪……”。

“行冬令，则阳气不胜”。“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综上所述，阴阳与五行两种思想的融合可能始于邹衍，终成于吕不韦。

五行解卦是对阴阳五行思想更加深入的探索和运用。在阴阳与五行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地结合在一起时，五行解卦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五行解卦思想产生于秦汉之际，是时代的必然。从《吕氏春秋》之后的历史来看，阴阳五行思想几乎成为秦汉之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

《淮南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月令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更加详尽地罗列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宇宙万物、四时人事的现象和制度，描绘出一幅天人感应的世界起始和变化图式。之后，由董仲舒最终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天人之间因阴阳五行而相通。

《吕氏春秋》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广博地解释和运用，使得阴阳五行理论从以往略带局部性的学术流派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主要的哲学思想。《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又进一步将阴阳五行深入地结合到儒道两家思想之中，使得阴阳五行思想在完善自身的同时，也彻底改造了世界。

大约同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也是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指导下，说明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以五运六气理论为主建立了一套有关人体生理机制的四时五运阴阳五行学说。由于人生健康医疗的客观性和现实性，《黄帝内经》使得阴阳五行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之中。

阴阳五行思想对于秦汉之际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强烈的。秦始皇就是根据“五德相胜”的思想以水德治国，事水尚黑，历法以十月为正，数以六为准，以阴杀为国策之本，严刑峻法。汉代秦之后，也是推衍五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汉武帝就是在董仲舒“三统说”的基础上颁布《太初历》，色尚黄，数用五，以至影响中国社会近两千年。

京房出生于武帝之后十年，生活在西汉初年的昭、元帝时期。由于社会普遍崇尚阴阳五行，学者们也就纷纷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著书立说。与此同时，也促进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例如，《淮南子》除了对五质、五性以及五行相生相克进行详细的阐述外，还全面地论述了五行寄生十二辰生旺墓绝、四时旺相休囚，甚至亥卯未三合木以及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五行阴阳会同等。至此，完整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京房将阴阳五行与易卦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独特的“五行易学”。五行易学的主体结构与集中表现就是八宫卦序。

参考文献

古籍：《周易参同契》，《周易集解》，帛书《易赞》，《京氏易传》，帛易《要》，《系辞》，《洪范》，《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生平

• 书讯 •

《认知·逻辑与价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出版本书虽以哲学史为背景，但又把它放在现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使之展现出哲学发展中不能绕过去的重要问题，如知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发展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更能体现康德著作的现代新义。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作者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温纯如。（《哲学研究》2003年第6期）